

增长、发展与变迁

—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研究

王玉茹 著

中国物资出版社

作者简介

王玉茹,1954年9月生,天津市人,现任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玉茹1972年毕业于天津市南开中学并留校任教。1977年恢复高考后,考入南开大学经济学系七七级政治经济学专业。1982年1月毕业后任职于天津商学院马列教研室,为管理系本科生讲授政治经济学课程。1985年9月考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经济史专业,师从刘佛丁教授攻读硕士研究生,1988年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任职于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从事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和研究生的教学工作。1991年师从吴承明教授在职攻读博士学位,1994年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在南开大学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市人民政府学位委员会第二届学科评议组(经济学组)成员。2004年1月开始任职于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曾先后于1989年11月~1991年4月在日本上智大学比较文化研究所和早稻田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1997年10月~1998年9月在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2002年10月~2003年3月在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部作访问学者。

自1985年开始从事经济史研究以来,参与和主持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教育部博士点基金课题、日本国文部省重点研究课题、以及其他国际和国内合作研究项目十余项。主要的学术研究领域为中国近代经济增长与发展、企业史、中外比较经济发展史等,以运用经济学理论和数理分析方法研究经济史为特色,并发表了系列研究成果。出版学术专著5部(含合著),教材1部,在国内核心期刊和国际著名学术刊物上用中、英、日文发表学术论文40

余篇。先后为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开设：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史、外国近代经济史、专业外语（专业英语、专业日语）等课程。多次应邀出席国内和国际专业学术会议，1998年8月和2002年7月，先后应邀出席世界经济史学会主办，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和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第12届、第13届世界经济史大会。

序

王玉茹教授是中国新一代的经济史学家。她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是从资料比较集中的个案即企业史入手的。80 年代中期,转入宏观经济增长与发展的研究;上世纪末,又致力于制度史的研究。这种由微观到宏观,由经济到包括政府行为和文化传统的制度史的研究,是适应当时的学术潮流,对一位青年学者的成长来说,也是十分有益的治学途径。本文集是王女士从她已发表的学术论文中自选出来的 17 篇作品,分别列入“经济增长与发展”“制度变迁”“企业史研究”三组。他们代表王玉茹 20 年来辛勤笔耕的成果,也反映她在经济史研究中不断开拓、创新和渐臻成熟的道路。

在企业史研究一组中,最具创新性的当属《开滦煤矿的资本集成和经营效益分析》。本篇原是作者攻读硕士学位的论文,经过删修,于 1994 年用英文发表于剑桥大学出版的《现代亚洲研究》。开滦煤矿是旧中国历史悠久、利润丰厚的大型英商,一向引人注目。惟前人研究主要集中于该矿的矿权问题、特权和垄断地位,以及劳动和包工制等问题。作者认为,该矿的丰厚利润除个别项目和战争年代得利于外商在华特权外,长期看主要还是企业本身的经营效益所致。因而她别辟蹊径,在生产方面,从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主要是资本与劳动投入的比率)来考察其成本与利润的关系;在销售方面,则着重考察该矿以占领市场为目标的价格政策和长期效果。这里作者是运用当时流行的厂商均衡价格理论,并依靠开滦档案资料的优势,建立了连续 33 年的各种统计和估计系列,使整个论证建立在计量分析的基础上。不过,在研究生产要素配置时,她所使用的主要投入比率,即该文英文版中 constant cost 与 wage cost 之比,实际计算的乃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不变资本与

可变资本之比,亦即资本的有机构成。这对于初建新式工业的中国来说(一如在 19 世纪的欧洲),无疑是更为适宜的。

此文为我国企业史的研究开辟了一个全新的途径,问世之后,令人耳目一新。但该文亦有专注于企业本身的经营,忽视它所处环境和历史条件的缺点,因此也未能避免计量经济学方法用于历史研究的局限性。例如该文结尾时,以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动和吨煤成本售价的变动作自变量,与成本利润率做回归分析,得出高达 0.97 的复相关系数,启人疑窦。这也说明,个案研究详细深入,是宏观研究的基础,但也需要以宏观研究为框架,避免孤立性。

进入宏观经济史研究后,王玉茹的第一篇代表作即文集集中的《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中国经济的发展》。该文首先是从总体上,即以工农业生产总值、国民收入、人均国民收入的年均增长率为指标,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1920~1936)的情况与前一时期(1887~1920)和后一时期(1936~1949)作比较,结果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年均增长率为 1.4%~1.8%,而前一时期仅只 1%,后一时期因战争关系均为负数。作者然后考察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产业结构的变化。在工业与农业、机制工业与手工业、新式运输业与旧式运输业的产值比重上,均有显著的优化;且重工业的发展快于轻工业,农业方面则经济作物的发展快于粮食和牲畜。最后,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资本产业的增长率达于外国在华资本;中国资本中,私人资本的增长率大于国有资本。又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工业产值的年均增长率(4.06%)高于同时期美、英、德、法(因受 1929 年危机影响),仅低于日本。因此判断,两次大战之间是旧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

1987 年该文发表后,曾引起争议。一是因为此前原有一种流行观点:认为旧中国经济的黄金时代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战后帝国主义卷土重来,加深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继之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由金融垄断进入工商业,加以帝国主义转嫁世界经济危机,造成中国农村凋敝,民族工业处于破产半破产境地。王玉茹文章

的观点与之完全相反,一时难以接受。二是因王文的论据完全建立在计量分析上,而其所用数据几乎全部是估计的,难以确信。并且,当时我国官方是采用苏联式的 MPS(物质生产)统计系统,对旧中国原来统计数据的适用性有所顾虑。这种情况,在 90 年代有了很大变化。一方面,1993 年我国采用国际通用的 SNA 统计系统后,学者们对旧中国的统计资料重新整理,看法渐趋一致。另一方面,兴起了过去几乎视为禁区的民国经济史的研究,王文中的观点逐渐得到认同。她本人也继续发表了系列论文(如本文集的第 2~6 篇),最后融入刘佛丁与她 and 于建玮共著,1997 年出版的《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一书。

在宏观经济史研究方面,王玉茹用功最多的还是她对旧中国相对价格亦即价格结构史的研究。这原是她攻读博士学位时的论文,目的在考察 1860 年至 1936 年相对价格变动和中国经济发展的关系。后几经修订,发表专题论文,又于 1997 年出版《近代中国价格结构研究》一书,并参加关于亚洲历史统计的国际学术合作项目。

王玉茹在中国价格史研究中有两项重要创新:一是把价格变动放在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周期运动中来考察(指各种经济形态都客观存在的中长周期运动),这是前人不曾涉及过的。二是关于生产要素价格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这也是前人未曾系统研究过的。周期性问题的,我已在为她的《价格结构》一书所作的序言中讨论过,这里就只谈关于生产要素价格问题,即本文集《近代中国生产要素市场价格初探》《生产要素相对价格变动与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两篇。

由于资料限制,作者对生产要素价格的考察限于资本价格即

利息率、劳动价格即工资率、土地价格即城乡地价三项,而不及技术。^① 作者考察了这三种相对价格变动对于工农业生产结构的影响和对于国民收入分配的影响。工业生产方面,因利息率下降而实际工资上升有限,以及城郊工业用地供应不缺,促进资本集成和资本有机构成有所提高的效果是比较明显的,如 30 年代棉纺织业的技术改革和生产资料生产较快发展等都与要素价格变动有关。农业方面,地价上升迅速而农业雇工实际工资甚至下降,使地主收益增加;而利息率的变化无何影响,土地经营资本甚少增长,农村一直保持小农模式。在分配方面,市场价格的相对变动也就是机会成本的变动会影响资源流动方向,但由于缺乏国民收入分配的统计,难以得出明确结论。大体上看,工资上升和利润水平低下,以至中国工业迄无自身积累能力,这由资本集成主要是业外投资可资证明。另方面,城乡租金收入占到非工薪收入的 70%,这就使得资源流向近代产业的流动异常缓慢,迄 1936 年,中国落后农业国的面貌没有什么改变。

利用相对价格和机会成本来说明经济的长期变动完全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内容。但这种方法也进一步暴露研究的孤立性和计量经济学的局限性。新古典经济学的原则是,假定国家不干预经济活动,制度为已定的不变的,并完全忽略文化传统的作用。这都不符合历史学要求。而计量经济学在建模时就只能设定三几个自变量,其他因素都假定不变,或归入残值而无从解释。D. C. 诺斯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赞扬了相对价格分析是研究经济变动的“上乘”方法,同时指出,在现有的几种长期经济变迁的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这恰恰是因为它包括了新古

^① 技术要素没有市场价格,一般是用余值法从经济增长实绩中测算中测算中性技术进步所提供人份值。当时已有希·珀金斯将此法用于他的《中国农业的发展》,但因假设的前提过多,未入正文结论,只作附录。或因此之故,王玉茹将技术一项舍去。

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①但马克思的框架过于理论化，缺少工具性，因而诺斯等另创新制度经济史学。新制度学派的经济史学仍是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但以结构改进代替古典的线性增长，加入了国家和意识形态两大要素，以及产权、交易成本等分析工具，成为比较实用的经济史理论。

这样，王玉茹将她的经济史研究转向于制度变迁。她与刘佛丁、张东刚共著的《制度变迁与中国近代工业化——以政府的行为分析为中心》2000年出版；在本文集中就是第10~13篇，特别是《中国近代政府的行为特征及其对国家工业化的影响》一篇。在这些研究中，作者对中国近代工业化过程的考察开拓了眼界，例如把它放在整个经济结构中、以至世界市场的组织中来观察；也对工业化进程加深了认识，例如对于产权、工厂制、公司制的历史分析，行业组织的演变等。在研究方法上，摆脱了单纯依靠计量分析的局限性，更多地采用了历史学的实证法和因果分析，有些地方并应用了中国史学特长的辩证观。这都显示作者的经济史研究渐臻成熟。

这项研究，因为是以政府行为分析为中心，着重于国家设订或认可的正式制度，而对于价值观、伦理道德、社会舆论、民间习俗等意识形态方面的制度，作者声明不在研究范围之内。只是在谈及制度的理论问题时，作者提出“文化是制度的基础，而制度是凝固了的文化”。这是个十分高明的见解。可惜限于主题，未能展开论证。

经济史是经济学和历史学交叉的学科，双方同等重要。A. 熊彼特在他的名著《经济分析史》中说：“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②所谓历史感、历史经验，看来有些抽象，其实就是指历史观（历史哲学）和历史学方法（如语言学、

① 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 1991 年版，第 68 页。

② 中译本第一卷，商务印书馆 1991 年版，第 29 页。

诠释学、考证学等)。这样看,新制度学派的经济史理论并不是很完善的,因为它缺乏清晰的历史观和重要的历史学方法。在我看来,以 F. 布罗代尔为代表的年鉴学派整体观的经济史研究,似乎更完善些。当然,以 J. 哈贝马斯为代表的交往理论,以 M. 福柯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史学,又提出许多近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值得注意。而对中国来说,则应当发挥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建立一个适合中国社会的经济史学。中国在经济学方面大体上落后于西方,但在历史学方面则一直具有优势。当然,建立中国的经济史学,需要长期的努力,不断开拓,不断创新,逐步完善,恐怕不是一代人的任务。但是我对于世纪之交的新一代中国经济史学家,有厚望焉。

吴承明

2004 年 5 月 8 日于北京

经济史理论与方法创新的思考^①

(自序)

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引进,我国经济史学的研究也从六七十年代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单一、研究视野狭窄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新理论和方法的引进为经济史学的发展创造了新的增长点,使我们看到了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广阔空间和生命力的所在。回想起80年代中期笔者用经济学理论和方法撰写的第一篇论文《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中国经济的发展》问世以后,曾引起了分歧,有的人甚至认为这不是经济史。随着改革的推进,政治上和理论上的禁锢被打破,本人的观点才逐渐被接受。而如今,用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研究经济史已经在很大范围内,特别是在年轻一代的经济史学工作者中成为时尚,这是十分可喜的现象。但是,引进新的理论、掌握和驾驭这种理论并运用它的方法却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正如刘佛丁教授在他关于经济史方法论的文章中多次强调的,我们引进新的理论和方法是要掌握一种工具、一种观察和分析事物的手段,就象生物学家手里的显微镜一样,是为了帮助我们掌握一种透过表面,看到事物本质的工具和方法,而

^① 本文原是笔者为2000年10月召开的“新世纪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展望国际学术研讨会”撰写的论文。笔者步入经济史研究领域后,先后得益于刘佛丁和吴承明两位恩师在研究理论和方法创新上的启发和鼓励,从而造就了笔者学术研究的特色。因此,以本文权作这个集子的自序,既体现了作者的研究风格,同时也是笔者从事经济史研究近20年的切身体会。

不只是套用一些概念^①。为此,我们不妨对世界经济史学理论的发展作一个反思,以便使我们从中受到一些启发。

一、经济史学理论创新的启示

回顾欧美历史学和经济史学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注重运用各种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对人类社会的历史作跨学科的研究为特色的年鉴学派,使经济史逐步跳出传统史学的巢臼,成为一门理性的、把复杂的经济社会历史现象作为一个体系来探讨的科学,从而产生了独立于传统历史学之外的现代经济史学。现代经济史学产生以后引入了 30 年代最流行的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价格理论、周期理论、国民收入统计和宏观经济分析、经济增长理论和计量经济学方法,向传统史学发起了有力的挑战。正如道格拉斯·诺思所指出的,新经济史学“它要求用系统的理论作为一般原则的来源,并要求同样系统地运用数量方法来组织数据资料”^②。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在经济史研究中的引用首先在美国经济史研究中取得了斐人的成就^③,他们采用宏观经济学的方法改写了美国经济史,实现了“经济史和经济理论的再统一”^④。在欧洲则出现了由意大利经济史学家卡洛·M·奇波拉主编的《欧洲经济史》六卷,从总需求的变动开始全方位的分

① “经济史创新的关键在于新理论和方法的引用”,《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 年第 1 期。

② 《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第 6 卷《经济史》,1938 年出版,第 46 页。

③ 这一时期美国新经济史研究的成果以罗伯特·福格尔的《铁路与美国的经济增长》、罗伯特·福格尔与斯坦利·恩格尔曼合著的《十字架上的岁月:美国黑人奴隶制经济学》为代表。

④ 福格尔:《经济史和经济理论的再统一》,载《美国经济评论》1965 年第 2 期。

析了近代工业社会在欧洲的兴起^①。进入 20 世纪 70 年代,经济史的研究引入制度经济学理论,出现了经济结构的研究。这种研究的集大成可以道格拉斯·诺思的《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和他与罗伯特·托马斯合著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为代表^②。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书中,诺思把古典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国家理论及意识形态的理论引入经济史研究,“为分析经济史实提供一个新的框架”^③。从而使经济史的研究进入了全方位、立体化研究的阶段。同时,也打破了过去在某一项研究中只运用某一种经济学流派理论的方法,给了我们一个综合运用不同的经济学理论流派的范例。但是这些研究都是以西方世界的兴起为研究对象来研究现代化的。

与此同时,西方学者在研究现代化的过程中,特别是研究西方以外的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对现代化理论反思的结果,即

① Carlo M. Cipolla edited , The Fontana History of Europe, William Collins Sons & Co . Ltd. Glasgow 1976. 中译本 1988 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②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 W. W. Niserson & Company, Inc. New York , 1981.

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 A New Economic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 中译本分别由上海三联书店和华夏出版社 1991 年、1999 年出版。

③ 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 1991 年版,第 1 页。

世界体系理论(world system theory)兴起^①。世界体系理论的基本研究方法就是从政治、经济和文明三个层面来分析世界历史的发展,重新构建世界秩序。它给我们的又一启示是不同的社会科学学科理论的综合运用。因此,世界体系理论产生后其影响即遍及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及人文地理学等主要社会科学领域。随着世界体系理论的兴起,更多的学者把目光转向了东方。近年来许多西方和日本的学者对亚洲,特别是中国的研究呈现出研究方法的多元化。继1984年美国学者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②之后,运用世界体系理论的日本著名经济史学者滨下武志教授为代表的一批日本学者对朝贡贸易和亚洲流通网络的研究^③;德国学者贡德·弗兰克从资本积累、货币的作用的视角对东方特别是中国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回眸^④。以及

① 世界体系理论兴起的标志是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教授、社会科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于1974年出版了《近代世界体系(第一卷):16世纪资本主义农业和欧洲世界经济的起源》(Modern World—System I:Capitalist Agricultur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World—Econom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然后在欧洲和其他地区和国家得到广泛的传播,并拥有专门的研究中心:即设在纽约州立大学厄姆顿分校成立的“布罗代尔经济、历史与文明研究中心”(Fernand Braudel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Econ—omical Systems and Civilizations)和期刊《评论》(Review)。

② Paul A. Cohen,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New York, 1984.

③ [日]滨下武志著:《近代中国の国际契机——朝贡贸易システムと近代アジア》东京大学出版会1990年出版,((《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杉山申也、Linda Grove编:《近代アジアの流通ネット□ウク》(近代亚洲的流通网络)日本创文社1999年出版。

④ Andre Gunder Frank, Reorient: The Glo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德]贡德·弗兰克著:《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译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出版)。

美国学者王国斌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从经济变化、国家形成和社会冲突三个方面中西对比研究中对欧洲经验的反思^①。美籍华裔学者李中清、王丰在人口史研究中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的探索^②。他们的研究无疑为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又打开了一扇通向中国经济史研究更高水平和更宽领域的光明之门。

二、中国经济史研究理论创新的反思

80年代初期文革结束后,百事从新,史学界也开始反思,曾经有过方法论的讨论。从那时起,吴承明先生多次撰文谈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③。在1987年发表的《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④和1995年发表的《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⑤两篇论文中,从历史观谈起,系统地分析了现代经济学理论如何在经济史研究中运用,对经济计量学方法、发展经济学方法、区域经济学方法、社会学方法、系统论方法等每一种理论对经济史研究的适用性和缺陷所在都有精辟的论述。为我们如何运用经济学理论及其他社

① R. Bin Wong, *China Transformed: Historical Change And The Limits Of European Experience*,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美]王国斌著:《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

② James Lee and Wang Feng, *One Quarter of Humanity: Malthusian Mythology and Chinese Realiti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99. (中译本《人类的四之分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现实》三联书店2000年出版)。

③ 吴承明:“关于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的意见”,载《晋阳学刊》1982年第2期。其他论文载吴承明著:《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

④ 载《红旗·内部文摘》1987年第8期;《轻工业经济研究》1987年第3期,《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第6辑,1987年4月。

⑤ 《经济研究》1995年第4期。

会科学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经济史作了具体的指导。吴先生指出：“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史的方法，历史又是研究经济学的最好的方法。”经济史它“应当成为经济学的源，而不是经济学的流。”^①以及“史无定法”，“经济史的研究可以根据问题的性质和可能，采取不同的经济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的方法来分析论证。”^②

从 80 年代中期开始，随着改革开放和国际交流的广泛开展，我国经济史学界，特别是中青年一代的经济史学工作者开始冲破传统的经济史学体系，在理论、方法和研究的框架上进行创新。80 年代中期以刘佛丁教授为代表的南开大学经济史学者，开始运用现代经济学理论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探索，经过十余年的努力已经建立起一个全新的研究框架，并取得了一系列在国内外卓有影响的研究成果^③。吴柏均、曹幸穗运用区域理论对无锡、苏南经济的研究^④，陈争平对近代中国国际收支的研究^⑤，朱荫贵对中

① 《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

② 王玉茹著《近代中国价格结构研究》序，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

③ 代表作：刘佛丁主编、王玉茹、赵津副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史》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 年出版；刘佛丁、王玉茹于建玮著：《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7 年出版；王玉茹、刘佛丁、张东刚著：《制度变迁与近代中国工业化——经政府行为分析为中心》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0 年出版；赵津著：《中国城市房地产业史论》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4 年出版，张东刚著：《总需求的变动趋势与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7 年出版；李一翔著：《近代中国银行与企业的关系，1897～1945》台湾东大图书公司 1997 年出版；张俐俐著：《近代中国旅游发展的经济透视》天津大学出版社 1998 年出版；刘巍著：《近代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货币需求》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0 年出版；李一文著：《从贸易角度分析中美关系》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0 年出版。

④ 吴柏均：《中国经济发展的区域研究》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6 年出版。
曹幸穗：《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6 年出版。

⑤ 陈争平著：《1895～1936 年中国国际收支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年出版。

日两国航运业的比较研究^①等一系列研究成果的出版,向我们展示了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新进展。但是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研究除了传统的方法之外,主要的创新领域仅仅是在经济学和区域研究方面,其他理论的引进还不多见^②,与国外经济史学理论的发展相比相差甚远。

三、中国经济史研究和教学如何面对新世纪经济史学理论创新的挑战

面对新的世纪如何把中国经济史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使中国经济史研究能够为世界经济史研究做出应有的贡献,首要的问题就进行理论与方法的创新,为经济史学的发展寻找新的增长点。世界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是一种多学科交叉的趋势,这就为我们从事经济史教学和研究的学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面对新世界经济史理论创新的挑战笔者认为应该解决好如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学术的百家争鸣为我们创造了研究的宽松的环境,多学科的交叉融合、信息的多元化为我们的理论创新提供了快速方便的条件。我们的经济史学工作者要对自身的条件进行评估,根据自身的知识结构和基础条件选择自己能够驾驭的学科领域,确定理论创新的方向,以达到真正能够掌握一门或多门相关学科的研究理论和方法,从而做到真正意义上的理论创新而不是只懂得一些皮毛,盲目的模仿。

第二,要加强国际间和国内的学术交流,加大介绍国外新理论和方法的力度,以扩大理论创新的领域。我们可以引进西方的先

① 朱荫贵著:《国家干预经济与中日近代化》东方出版社 1994 年出版。

② 运用社会心理学研究近代经济史参见宋美云:《试析近代天津资产阶级面对现代化的心理和行动(1903~1927)》载《史学月刊》1999 年第 4 期。

进技术建设我们的物质文明,为什么不能引进西方的理论和方法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呢。特别是在一些新型的学科领域,我们应该像在自然科学领域一样,勇于跻身于世界社会科学研究的第一梯队。

第三,要克服那种西方历史上有的我国历史上也会有的民族心态在研究工作中形成的“中国情结”,改变套用西方的概念在中国历史上寻找的倾向。不可否认,中国有悠久的历史 and 古老的文明,但是我们更应该承认在近代我们落后了,历史只能说明过去,不能成为我们前进的包袱,更不能成为我们前进路上的障碍。当然理论创新不是模仿,而是要在搞清史实的前提下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创新。对于我们年轻一代的经济史学者来说,吸收西方先进的理论营养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历史的实际进行创新才是最重要的。

第四,从事经济史教学的经济史学者则更多了一层为未来的经济史研究培养队伍的责任。一方面,在不断充实自己更新知识结构的同时要有一种宽阔的胸怀,引导和启发学生进行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创新,允许学生有与自己不同、甚至相反的学术观点。另一方面,要在课程设置上注重基本理论和方法的培养和训练,特别是统计学等方法的训练。近年来笔者在国际交往中,深感中国经济史学者在这方面的差距,由于这些差距使我们的很多学者不能参与到国际合作研究中去,失去了与国际前卫水平的学者一起工作的机会。我们常常抱怨统计资料的缺乏,但是当具备了这些资料的时候,我们是否可以有效的利用这些统计资料进行研究呢。

参考文献

[1]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